

一个找到自己深耕写作题材的作家是有福的,更何况这个题材是故宫。近些年来,祝勇的故宫写作,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。

祝勇已出版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《故宫的古画之美》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等十几部围绕故宫的著作,被称赞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“纸上的故宫”。近两年,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: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、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——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。

2023年6月,《故宫文物南迁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,为“纸上的故宫”作品系列又添新篇章。6月15日,这本书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,多位资深文学评论家出席发布会并集中展开研讨。

用文学建造“纸上的故宫”

祝勇新作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出版



祝勇(本人供图)

近30年的散文艺术探索之旅

散文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源远流长、底蕴丰厚。从先秦诸子思想哲学散文到《史记》这种叙事体散文,再到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这样文采飞扬的千古绝唱,完成了散文文学系统话语的构建,是中国文学的根脉正宗。

在现代社会,比起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等体裁,散文的写作群体应该是最庞大的。发的微博、写的朋友圈,以及在实体书店最显眼位置摆放的成功学或者心灵鸡汤,都算是广义上的散文。但在语言上进行修辞练句,在见识上进行拓展,在思想上凝练深刻把握的散文,是文学意义上的艺术作品。

当代作家群体里,祝勇的散文写作起步较早,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就倡导并实践新散文写作,成就卓著,是国内“新散文派”的主力干将。早在1996年、1998年、2001年、2003年,祝勇就主编《新锐文丛》《声音的重量》《深呼吸丛书》《新散文九人集》等散文集。尤其是他自2003年起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《布老虎散文》,以及2003年至2009年期间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散文年选,都是以“新散文”的作品为主,也蔚为规模。2022年8月,祝勇、钟鸣、于坚、冯秋子、宁肯、张锐锋、蒋蓝、周晓枫八位代表作家共16篇散文集结出《破冰》散文集,努力描摹“新散文”创作自发韧至青春蓬勃三十余年的吉光片羽。

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,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,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。这在他的“纸上的故宫”作品系列表现得很明显。

《故宫文物南迁》正文共分9章:烽烟南渡、徘徊京沪、钟山风雨、西迁南路、西迁中路、西迁北路、沦陷之城、东归北返、一官两院。翻开书可以看到,祝勇的书写明显采用了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,比如讲故事,场景转换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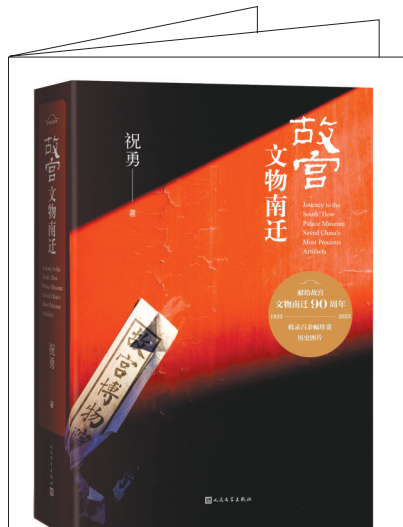
比如在书中“从皇宫到博物院”章节中,祝勇的写作就非常有画面感:

1924年,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,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,不仅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,逼走了吴佩孚,而且为使封建帝制永无复辟的机会,索性将“末代皇帝”溥仪赶出紫禁城。溥仪出宫时,敬懿皇贵太妃(同治皇帝的瑜妃,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)将乾隆皇帝最爱的“三希贴”中的“两希”——王献之《中秋帖》(宋摹本)和王珣《伯远帖》携带出宫,后来通过娘家侄孙,以低价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——品古斋。而“三希”的另外“一希”——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(唐代精摹本),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。溥仪仓皇辞庙,来不及带上衣物,第二天,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,把《快雪时晴帖》塞进衣物中,出神武门时,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,上去检查,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《快雪时晴帖》,当场扣下,交给李石曾先生。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,将《快雪时晴帖》存入保险柜中。被乾隆皇帝时把玩、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,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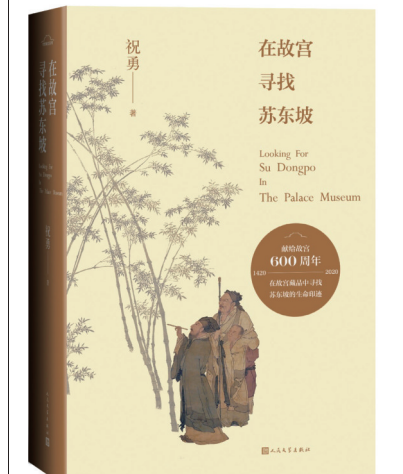
在另外一处,祝勇这样描述“皇妃革命”那段历史:

1931年8月25日,“末代皇妃”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,以散心为由,悄然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静园,几天后向法院起诉,与溥仪离婚。这一天,距离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,只有二十四天。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,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给溥仪,从此开始了“孤灯伴泪夜难眠”的“皇妃”生涯,那一年,她只有十三岁。她在结婚时穿用过的两件礼服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织绣藏品中。九年后,她在给妹妹文珊的信中这样评述她的婚姻生活:“姊受专制家庭非人类待遇已九载矣!无日不以泪洗面,薄命如斯,夫复何言!惟逆来顺受、苟延残喘而已……世界之大,姊之所受压迫、虐待可为第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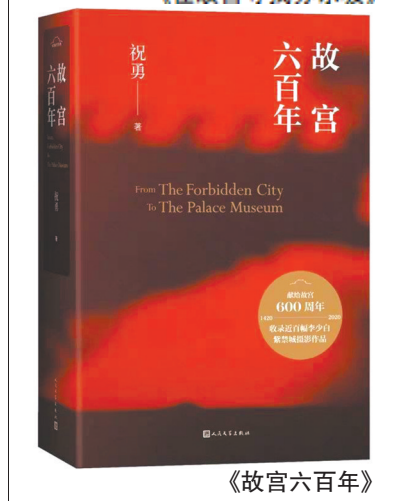
《故宫文物南迁》的写作,仿佛是对《故宫六百年》的接续,又像是将《故宫六百年》的结尾进行了展开和放大。



《故宫文物南迁》



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



《故宫六百年》

他们在首席专家郑欣淼先生带领下进行“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”这一课题研究,以及他本人写作《故宫文物南迁》的意义所在。

打捞历史,让岁月显影,殊为不易。在写作的两年中,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,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、辽宁省博物馆、重庆市档案馆、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;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,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、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、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;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、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、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,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宝鸡、贵阳、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,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。

尽管此前祝勇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,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,但随着这次专程采访、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,那场肇始于八十多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,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,在祝勇心里逐渐展开,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。

如此舟车劳顿、上下求索,虽然辛苦但祝勇收获满满,感慨良多。“在那个战乱的年代,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,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、地上的枪炮的威胁,还要面对急流险滩、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,更不用说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。总之,几乎人世间的艰难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,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,要他们肩扛起来,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。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,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,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、稳健无虞。这样的挑战,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,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,假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,我们是否有勇气、有能力把它扛起来?正是这些艰辛,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,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。”

两年中,除了调查和拍摄,祝勇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《故宫艺术史》的写作中,“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,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”。随着写作的深入,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他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,他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,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,不惧“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”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。“如是,这次写作的长旅,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、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。故宫文物南迁,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,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。”

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

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。对这个时间节点,祝勇很敏感:“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,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,我辈如不努力,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,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。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,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,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。”

祝勇说,正因为这种脆弱性,成为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